

荣誉的力量: 共建共享全国文明城市 增强企业纳税遵从了吗^{*}

詹新宇 王一欢

内容提要: 构建政府部门和纳税企业共建共享的新型征纳关系,是新时期实现中国税收征管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而同样兼具“共建”和“共享”特征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是中国典型的城市治理新模式。为此,本文以2005—2019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共建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遵从。研究发现,共建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模式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征纳双方在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前的共建阶段所形成的规范效应和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的共享荣誉阶段所形成的激励效应皆显著促进了辖区企业纳税遵从度的提高,并且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在不同城市层级、不同企业税收优惠条件和不同生命周期企业方面都呈现鲜明的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城市治理模式不仅是增强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而且是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完善“中国之治”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文明城市 纳税遵从 政府治理 税收共治

作者简介: 詹新宇,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教授,10004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430073;

王一欢(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430073。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02(2022)10-0040-17

DOI:10.19795/j.cnki.cn11-1166/f.20221018.012

一、引言

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是“十四五”时期加快构建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不仅表现为税制结构和税收体系的优化完善,而且表现为征管制度的与时俱进。近年来,无论是《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颁布后针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的联合惩戒措施,还是金税三期工程全面推行以来信息化监管的广泛应用,都显著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李林木等,2020;张克中等,2020;樊勇、李昊楠,2020;Brink和Hansen,2020),然而革新征管手段仅能反映税收征管现代化的部分内涵,更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政府间财政关系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研究”(20FJYB014)。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王一欢电子邮箱: wyhznuel@163.com。

重要的是如何创新税收征管理念。当前阶段,税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的传统观念逐渐被“税收治理”所取代(郭月梅、厉晓 2017)。在此背景下,构建政府部门和纳税主体共同参与的税收共治格局,形成政府和纳税人共建共享的新型征管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

为贯彻新型征管体系中的共建共享理念,政府的征税目标要逐渐从“政府部门多征税”转变为“企业主动多缴税”,相应地要更加重视如何增强企业的纳税遵从。基于微观市场主体的研究发现,公民意识、道德信仰以及社会秩序等非征管因素有效弥补了行政、司法等强制手段的缺陷,使得企业的纳税遵从行为显著改善(Yuniarta 和 Purnamawati, 2020; Alm 等, 2019; Rahayu, 2017; Jimenez 和 Iyer, 2016; 田彬彬、邢思敏, 2017)。这些带有规范性质的软约束形式虽然有助于弱化企业偷逃税款的不良动机,但无法激发企业积极纳税的内在动力。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显示,赋予纳税人更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能有效削弱企业的纳税痛感,从而激励企业积极纳税(Dinku 和 Alamirew, 2018; Lamberton 等, 2018; 赵磊, 2016)。譬如,2014 年改革后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使 A 级纳税人不仅能获得便利服务、联合激励等直接好处,而且能凭借良好声誉缓解自身的融资压力,企业的纳税遵从行为明显增多(孙雪娇等, 2019; 李建军、范源源, 2020)。再如,报税软件的便民化设计使纳税人自主筹划出最优缴税方案来减轻自身负担,也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纳税(Hunt 和 Iyer, 2018)。不难看出,发挥公共政策的激励作用,使辖区企业从城市公共政策和公共活动中获益,是推动企业积极纳税的关键。

兼具“共建”和“共享”特征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是中国典型的城市治理新模式。这是因为,在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前的共建阶段,在争创文明城市荣誉力量的持续感召下,地方政府、辖区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了“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等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争创文明城市活动,地方政府在营造更好的政务环境、经营环境、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方面获得了辖区企业和居民的通力支持与配合。在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辖区内的纳税企业赢得了多方面的荣誉共享。首先,文明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维护以及市场环境营造上投入了大量经济资源,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明显下降,经济活动中的摩擦与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明显降低,生产效率、利润绩效不断提升(吴海民等, 2015; 龚锋等, 2018; 石大千等, 2019)。其次,文明城市在污染防治、生态治理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享受到了环境福利(逯进等, 2020)。最后,文明城市荣誉称号集聚的品牌效应强化了该地对资源要素的虹吸能力,企业产出随之增加(姚鹏等, 2021)。由此可见,文明城市创建极大地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为其创造了真金白银的实质财富。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惠及辖区企业的过程,也是政府部门和纳税企业共享税收权益的过程。那么,文明城市在共建和共享阶段对辖区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又如何呢?

为此,本文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探究共建共享城市治理新模式对辖区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共建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框架,深入考察文明城市创建各阶段的经济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前的共建阶段对辖区企业的主要影响表现为规范效应,而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的共享荣誉阶段对辖区企业的主要影响则表现为激励效应。这一结论丰富了文明城市创建的现实意义,为全面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二,立足共建共享的税收治理格局,探寻共建共享新型征纳关系的实现路径。本文研究表明,共享税收权益是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并且共建新型征纳关系离不开政府部门和纳

税企业之间的收益共享。这一结论为新时代如何加快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同时也为完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三,深植共建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探索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新模式。本文研究发现,在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征管格局中赋予纳税企业更多的能动性有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这一结论为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之治”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异质性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将包括文明城市创建在内的三大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各级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潮。次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文明委”)来督办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该机构的最高领导从第二届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担任,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1999年和2002年,中央文明委公布了两批共98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城市(区),彼时由于尚处于摸索试水阶段,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既无客观具体的评判标准,也无明确严谨的组织程序。2003年,中央文明委颁布实施《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依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开展,参评单位分为直辖市城区、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四级,在申报前须同时满足连续两年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获得并保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城市(2015年之后改为提名城市)称号等6个先决条件,然后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提前公示、择优评选的程序进行遴选,评选表彰周期为三年,至此建立了文明城市评选的基本框架。在经历近十年的准备阶段后,中央文明委于2005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12个城市,并于2009年、2011年、2015年和2017年又评选出四批全国文明城市。

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逐渐向系统化、规范化和严格化演变,文明城市的内涵也由最初的精神文明领域延伸到政务环境、营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全方位、立体式的广阔空间(鲍宗豪,2011)。文明城市创建致力于构建更加文明、和谐、美丽的市民社会,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建共享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与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相对应的是,为避免因评比表彰泛滥而引发形式主义和资源浪费,中纪委联合人社部等多部门于2006—2009年对全国148405个评比表彰活动“挤水分”,最终只保留了4218个项目。^①其他评选活动被陆续“挤水分”之后,作为最高规格、最具价值和最难获得的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这一金字招牌越发显得珍贵,已经成为入选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最具影响的战略资源,地方政府无不为此不遗余力。^②在全国文明城市这一无上荣誉力量的持续推动下,参与创建城市的市容市貌

^① 2013年国务院又取消了近100项评比表彰活动。

^② 例如,《武汉市2014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列出10种问责情形,对治理不好、履责不到位的部门和当事人进行严肃问责;湘潭市2017年召开由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周密部署文明城市创建攻坚战;常州市2021年将文明城市创建写入《常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典型全国文明城市;等等。

焕然一新,政务环境、营商环境、人文环境也迈向更高水平。

由于文明城市的荣誉称号在届期内实行动态管理,相关部门每年都对其复查审核,工作严重滑坡、出现重大问题的城市将被撤销文明城市称号,可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绝非一劳永逸,获得这一金字招牌的城市还需时刻警惕退出风险。为此,地方政府纷纷建立逐级追责制度,压实文明城市创建责任,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掺水、不减值。^①文明城市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对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二) 理论分析

全国文明城市除了有着严苛的准入门槛和淘汰机制外,考核标准之综合全面和系统完备在所有城市荣誉称号中也首屈一指。以2017年的考核体系为例,参评城市面临牢固的思想道德基础、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以及长效常态的创建工作机制三大板块的90项测评内容和188条测评标准的严格考验。^②

随着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深入推进,文明的内涵愈加丰富,参与创建城市不仅要在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传统领域斩获高分,而且要力求在辖区内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和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③为此,政府积极致力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以及诚信教育实践和奖惩制度的实施,这些措施不仅降低了城市治理的综合成本,而且提高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规范化程度,加快了融入社会共治格局的步伐。

与生态人文环境的改善相比,公共秩序和社会规则的优化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其中。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共建文明城市的过程加深了双方之间的联系,使征纳双方建立起更为牢固的互信关系,纳税人主动遵从的意愿明显提升。正如前文所述,道德、秩序和公民意识等非征管因素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因而共建文明城市产生的规范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纳税遵从。

文明城市正式获批之后,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便进入了共享荣誉阶段。在共享荣誉阶段,辖区内纳税企业至少可以共享以下三个方面的收益:其一,文明城市创建实质上推动了地方政府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推进政务信息化和便民化等“放管服”改革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政务环境,降低了企业的遵从成本和交易费用,在为企业解绑减负、拓宽利润空间的同时,也激发了市场配置资源和创新创造的活力;其二,文明城市评选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等测评项目上设置了硬性指标,促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要素资源和优惠政策用于经济发展,辖区企业的生产经营绩效不断提升(吴海民等,2015;石大千等,2019);其三,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改善既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又通过城市品牌效应提升了汇聚优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文明城市创建使企业获益匪浅,这种共享税收收益的方式形成了激励效应,促使企业在纳税时产生更强烈的遵从意愿。从征纳关系的视角分析财政行为,会发现政府调整支出策略的过程往往伴随纳税人受益程度的改变,文明城市创建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将税收更高效、更直接和更有

① 各地市文明网的新闻动态显示,中山、榆林、十堰、襄阳、曲靖、株洲、衢州、汕头等城市都明确表态要对文明城市创建督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从严从重处理。

② 参见中央文明委2012年以来颁布的各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③ 参见中央文明委发布的《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17年版)》。

针对性地用于纳税人感知明显、最为关切的民生领域。对于企业而言,缴纳的税款通过营商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提升以及政策红利释放等多种渠道回馈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相较于信用评级制度中的联合激励措施,文明城市创建无疑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当税收权益以显性资产的形式落到实处时,税收的直接偿还性便越发突出,企业纳税的痛感不断降低,从而激励企业主动缴纳税款。

为更好地诠释共建共享文明城市的实际影响,表1列示了各城市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典型事迹。

表1 共建共享文明城市的影响示例

类别	开展方式	代表城市或地区	典型事迹
共建阶段的规范效应	政府引导公共秩序建设	天津多个城区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把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明确了执法内容、执法主体、执法标准等主要条款
		山东滨州	依托市工商部门多次组织培训会、经验交流会,加强对企业的诚信道德教育、社会责任培养
		云南昆明	把加强信用记录和推进共享平台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大数据、“互联网+”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中的作用
		江西萍乡	将诚信建设制度化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营造诚实、守信、自律、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浙江杭州	基于“信用惠民”的理念,以信用积分的形式落实信用社会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信用氛围
	企业主动融入社会共治格局	湖南湘潭	数家国有企业在市容市貌、交通秩序以及公益服务等方面展现国企担当,积极主动配合政府工作
		安徽宣城	多家民营企业组织员工学习文明精神,广泛宣传诚信经营理念
共享荣誉阶段的激励效应	优化营商环境	河北廊坊	瞄准薄弱环节,全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河北承德	集中精力整治行政窗口服务环境、服务态度和文明服务差等问题
		陕西铜川	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全力以赴整治城市环境秩序
		湖北武汉	将深化文明窗口创建、提升窗口优质服务、加强公共秩序管理以及优化公共环境秩序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专项活动
		河北唐山	积极落实“审批事项最少、收费标准最低、办事效率最快、服务水平最优”等目标,仅2017年就为实体经济降低成本54亿元
	创造物质条件	四川绵阳	不断巩固文明城市建设成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人才和资本持续流入,加快推动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新闻报道整理。

综上,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前,地方政府与纳税企业的一系列共建行为对辖区企业纳税遵从客观上形成了规范效应;而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共享文明城市荣誉又对辖区企业纳税遵从度产生了激励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在文明城市共建阶段的规范效应和共享荣誉阶段的激励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文明城市创建提高了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构建

由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是分批次进行的,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来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辖区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Beck 等 2010):

$$TC_{csit} = \alpha_0 + \alpha_1 Civilization_{ct} + \sum \alpha_j X_{csit} + \sum \alpha_k Y_{ct} + City_c + Industry_s + Year_t + \varepsilon_{cs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TC 为企业纳税遵从度,核心解释变量 $Civilization$ 是指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与否的虚拟变量, X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Y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c, s, i, t 分别代表城市、行业、企业和时间。另外,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城市虚拟变量 $City$ 以及年份虚拟变量 $Year$ 来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二) 变量说明

企业纳税遵从度 TC 采取名义税率法,即用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值来反映(刘行、赵晓阳 2019; 许红梅、李春涛 2020),其中实际税率的计算公式为(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税前会计利润,名义税率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测度的 TC 是一个反向指标, TC 的值越小,表明企业纳税遵从度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 $Civilization1$ 用文明城市创建的虚拟变量来反映。具体做法是将地级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前 2 年及入选之后的所有年份都赋值为 1,其余年份赋值为 0;始终未获此殊荣的城市样本则均赋值为 0(吴海民等 2015; 龚锋等 2018; 石大千等 2019)。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文明城市每 3 年评选一次,比如 2017 年公布了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对于第五届入选城市而言,至少从 2015 年就开始进入了争创文明城市状态。为此,将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前 2 年、前 1 年和当年 $Civilization1$ 都设定为 1,用以反映入选城市的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对文明城市的共建阶段。将入选之后各年份 $Civilization1$ 都设定为 1,用以反映入选城市的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对文明城市的共享荣誉阶段。此外,本文还设置了文明城市创建时长变量 $Civilization2$,用以反映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给入选城市带来的持续影响,具体方法为从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前 2 年起,计算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长,将其加 1 并取自然对数。此时的实证方程则变为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刘树海 2019; 许红梅、李春涛 2020; 魏志华、夏太彪 2020; 张克中等 2020),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 2。由于中央文明委先后于 2005 年、2009 年、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公布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各地区文明城市创建成功的时间跨度极广,因此本文选取 2005—2019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基准回归的样本。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年均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固定资产比率	<i>Capint</i>	固定资产/总资产
自由现金流水平	<i>Cash</i>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总资产
政府补贴水平	<i>Subsidy</i>	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营业收入

续表 2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投资收益率	<i>Eqing</i>	投资收益/总资产
收入增长率	<i>Saleadd</i>	当期营业收入增加值/上期营业收入
资产收益率	<i>Roa</i>	净利润/总资产
政府赤字率	<i>Deficit</i>	(财政支出 - 财政收入) /GDP
产业结构	<i>Estate</i>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对于城市层面的数据,本文做了如下处理:(1)为尽可能减少数据上的异质性,在全样本中剔除了直辖市、少数民族自治州(盟、旗)以及省直管县或县级市,只保留地级市数据;^①(2)山东莱芜于2019年变为山东济南的市辖区,为保证样本前后一致,剔除了此类行政级别前后不一致的个体;(3)剔除了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跳跃”的城市,即剔除了大庆、深圳、广州、中山、南京和青岛6座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时间不连续的城市,并将南昌、珠海、临沂和江门4座城市因文明城市复核未通过的2017—2019年样本剔除。^②

对于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做了如下处理。首先,剔除了以下样本:(1)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退市风险警示公司(ST公司);(3)最终控制人不详的上市公司;(4)样本期内所有权性质发生变化的公司;(5)缺失数据较多且无法补充的公司(张辽、吴耸杰,2020;黄贤环、王瑶,2019)。其次,结合变量特征,剔除了总资产为负、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政府补助为负、实际税率大于1或小于-1等的异常值。

本文的文明城市数据来自笔者对中国文明网披露的各批次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城市和提名城市等数据的整理,企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城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排除异常值对实证结论的干扰,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i>TC</i>	0.0049	0.1413	-0.0022	0.1378	0.0112	0.1440
<i>Civilization1</i>	0.5534	0.4972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i>Civilization2</i>	0.9127	0.9787	1.6492	0.7183	0.0000	0.0000
<i>Size</i>	21.8224	1.1487	21.9730	1.1711	21.6900	1.1119
<i>Lev</i>	0.4402	0.1918	0.4235	0.1940	0.4550	0.1886
<i>Capint</i>	0.2504	0.1583	0.2215	0.1495	0.2758	0.1615
<i>Cash</i>	0.0537	0.0715	0.0525	0.0692	0.0547	0.0735

① 剔除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早于隶属地级市的县或县级市(如胶州、梅河口、西峡、永城和张家港)以及所有省直管市(如河南济源、湖北仙桃、潜江等)。

② 这些城市在样本期内均被撤销过“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其中大庆等6座城市在样本期内被复评为全国文明城市,而南昌等4座城市未被成功复评。剔除的原因是,它们有时在对照组,有时又在处理组。

续表 3

变量	全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i>Subsidy</i>	0.0084	0.0131	0.0097	0.0140	0.0072	0.0121
<i>Eqing</i>	0.0054	0.0120	0.0059	0.0120	0.0049	0.0119
<i>Saleadd</i>	0.1542	0.2700	0.1546	0.2717	0.1538	0.2685
<i>Roa</i>	0.0479	0.0507	0.0502	0.0487	0.0458	0.0523
<i>Deficit</i>	0.0464	0.0686	0.0289	0.0385	0.0618	0.0839
<i>Estate</i>	0.9862	0.4467	1.0557	0.4333	0.9250	0.4494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4 报告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第(1)、第(2)列的解释变量是文明城市创建的虚拟变量 *Civilization1*,第(3)、第(4)列的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文明城市创建时长 *Civilization2*;第(1)、第(3)列仅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第(2)、第(4)列则引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比较它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效应系数 α_1 估计值的绝对值略有下降,但都显著为负。从第(2)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文明城市创建使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提高了 0.99 个百分点;从第(4)列的回归结果来看,随着文明城市创建时长的增加,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提高了 0.40 个百分点。可见,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企业纳税遵从度提高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基准回归结果较好地证实了本文研究假说的成立,即文明城市创建显著提高了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这表明,文明城市创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建共享城市治理新模式对新时代构建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共建共享新型征纳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双重差分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i>Civilization1</i>	-0.0129 *** (0.0028)	-0.0099 *** (0.0031)		
<i>Civilization2</i>			-0.0050 *** (0.0014)	-0.0040 ** (0.0017)
<i>Size</i>		-0.0068 *** (0.0015)		-0.0070 *** (0.0014)
<i>Lev</i>		-0.0009 (0.0089)		-0.0002 (0.0089)
<i>Capint</i>		0.0833 *** (0.0108)		0.0839 *** (0.0108)

续表 4

变量	(1)	(2)	(3)	(4)
	双重差分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i>Cash</i>		0.0734 *** (0.0194)		0.0738 *** (0.0194)
<i>Subsidy</i>		0.0079 (0.1032)		-0.0053 (0.1028)
<i>Eqing</i>		1.1581 *** (0.1162)		1.1620 *** (0.1163)
<i>Saleadd</i>		-0.0000 (0.0051)		-0.0001 (0.0051)
<i>Roa</i>		-0.1400 *** (0.0370)		-0.1403 *** (0.0370)
<i>Deficit</i>		-0.0061 (0.0191)		-0.0016 (0.0191)
<i>Estate</i>		0.0065 (0.0043)		0.0062 (0.0044)
地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110 *** (0.0019)	0.1232 *** (0.0296)	0.0090 *** (0.0017)	0.1250 *** (0.0297)
观测值	15783	13620	15783	13620
R ²	0.0322	0.0485	0.0314	0.0481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越大,纳税遵从的积极性越高,这是因为大企业通常是税务机关稽查、审核以及常态化管理的重点对象。税收征管的巨大压力迫使其放弃避税手段(范子英、田彬彬,2016)。此外,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水平或投资收益率越高,纳税遵从度就越低,这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陈德球等,2016;许红梅、李春涛,2020)。

(二) 影响机制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增强了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从而有助于推进新时代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共建共享新型征纳关系的建立。但是,文明城市共建和共享分别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度仍需进一步验证。为此,本文通过两阶段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

$$Middle_{csit} = \beta_0 + \beta_1 Civilization_{ct} + \sum \beta_j X_{csit} + \sum \beta_k Y_{ct} + City_c + Industry_s + Year_t + \varepsilon_{csit} \quad (2)$$

$$TC_{csit} = \gamma_0 + \gamma_1 Civilization_{ct} + \gamma_2 Middle_{csit} + \sum \gamma_j X_{csit} + \sum \gamma_k Y_{ct} + City_c + Industry_s + Year_t + \varepsilon_{csit} \quad (3)$$

其中 *Middle* 是待检验的中介变量 ,其他设定与基准回归大体保持一致。方程(2) 用来检验第一阶段文明城市创建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方程(3) 则主要检验第二阶段中介变量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中介变量 *Middle* 主要包括以下三项指标。

第一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该指标用于验证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前 ,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共建阶段的规范效应是否存在 ,具体使用沪交所和深交所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结果 ,我们将 A(优秀) 定义为 4、B(良好) 定义为 3、C(及格) 定义为 2、D(不及格) 定义为 1。不难看出 ,该指标值越大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其主动融入社会共治格局的意愿越强 ,同时也表明政府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规范社会秩序的努力越有效。^①

第二 ,企业所处营商环境。该指标用于验证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 ,政府是否为企业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 ,具体使用上市公司所在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来反映(毕青苗等 ,2018) 。倘若创建文明城市推动了辖区行政审批中心的发展 ,则说明企业所处营商环境得到改善 ,而这正是企业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条件。

第三 ,企业生产经营绩效。该指标用于验证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 ,政府部门与纳税企业共享荣誉阶段对纳税企业的激励效应是否存在 ,具体通过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来测度(余泳泽等 2020; 朱光顺等 2020)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索洛余值”表示的综合生产率 ,其值越大 ,证明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

表 5 反映的是各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Civilization1*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文明城市共建阶段 ,政府部门和纳税企业的共建行为显著提升了辖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可以看出 ,共建文明城市获得了纳税企业的支持与配合 ,并激发了企业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共规则的主动性 ,即产生了规范效应。第(2) 列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创建文明城市确实促进了辖区行政审批中心的发展 ,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得到充分改善。第(3) 列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的共享荣誉阶段 ,在文明城市荣誉力量的作用下 ,纳税企业的生产经营绩效得到显著提升。第(2) 、第(3)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的共享荣誉阶段 ,文明城市创建给纳税企业带来了显著的激励效应。

表 5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第一阶段: 中介变量受影响程度			第二阶段: 中介变量效应		
	信息披露质量	营商环境	生产经营绩效	信息披露质量	营商环境	生产经营绩效
<i>Middle</i>				-0. 0052* (0. 0031)	-0. 0263* (0. 0159)	-0. 0792* (0. 0479)
<i>Civilization1</i>	0. 0347* (0. 0184)	0. 0029* (0. 0016)	0. 0014** (0. 0006)	-0. 0075** (0. 0034)	-0. 0093*** (0. 0031)	-0. 0095*** (0. 0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① 在进行机制分析时 ,当被解释变量为信息披露质量时 ,为体现文明城市共建阶段 ,本文剔除了各地级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年份的样本。

续表 5

变量	(1)	(2)	(3)	(4)	(5)	(6)
	第一阶段: 中介变量受影响程度			第二阶段: 中介变量效应		
	信息披露质量	营商环境	生产经营绩效	信息披露质量	营商环境	生产经营绩效
常数项	1.1082 *** (0.0397)	-0.2874 *** (0.0126)	1.8837 *** (0.0060)	0.1836 *** (0.0413)	0.0919 *** (0.0283)	0.2750 *** (0.0944)
观测值	7325	13840	13866	7228	13567	13599
R ²	0.1820	0.2023	0.5953	0.0562	0.0417	0.0493

表 5 第(4)至第(6)列反映的是中介变量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其中,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是文明城市创建规范效应的机制变量,反映出纳税企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在文明城市共建阶段进行普法教育、社会治理整顿和市场秩序维护,在规范效应作用下,更加积极地履行纳税人义务,并主动解缴税款。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的改善增强了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意愿。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纳税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的提高是影响文明城市创建激励效应的机制变量,反映出纳税企业在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的共享荣誉阶段享受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带来的营商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城市品牌效应带来的外溢效应,使得纳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下降和生产效率提升,进而使纳税企业产生了“投桃报李”式的正向反馈,纳税遵从意愿不断增强。^①

(三) 稳健性检验

虽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一项出色的准自然实验能够有效识别政府行为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但本文基准回归模型忽视的部分因素可能会影响实证结论的稳健性。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②

第一,排除模型误设。首先是平行趋势检验。本文据此来证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冲击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是安慰剂检验。为验证企业纳税遵从积极性的提高是否源自无法捕捉和观测的制度、政策或事件,本文做了两种不同思路的安慰剂检验。再次是为尽可能缩小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财政收支以及金融发展等基本特征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熵平衡法重新匹配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政策效应。最后是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变化。本文分别使用聚类到省份和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并且控制了地区、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此外,本文还重新引入企业虚拟变量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第二,考虑测量误差。鉴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可能存在准度和精度的偏差,本文更换文明城市创建和企业纳税遵从度的代理变量,检验前述结论是否仍旧成立。

第三,排除竞争性假说。一方面,本文样本期内发生了推行金税三期工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等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事件,需通过不同方法消除这些特殊事件的干预;另一方面,企业积极纳税

① 从表 5 的第(4)至第(6)列可知,生产经营绩效、信息披露质量在文明城市创建影响企业纳税遵从度的过程中仅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② 考虑到历届文明城市创建评价体系均未将政府税收、企业税负以及税收征管等相关内容作为考核指标,文明城市创建这一事件冲击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是足够外生的,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本文未做反向因果检验。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未予展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可能是税收征管强度变化的结果,而并非主要受到文明城市创建行动的影响。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基准回归的系数将被高估。本文将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重新做了回归。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企业纳税遵从度受到城市行政层级、企业税收优惠条件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干预,文明城市创建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纳税遵从度产生差异化影响。本部分拟从城市行政层级、企业税收优惠条件以及企业发展阶段三个方面进行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异质性分析,设计模型如下:

$$TC_{cit} = \beta_0 + \beta_1 Civilization_{cit} + \beta_2 Civilization_{cit} \times DV_{cit} + \beta_3 DV_{cit} + \sum \beta_j X_{cit} + \sum \beta_k Y_{cit} + City_c + Industry_s + Year_t + \varepsilon_{cit} \quad (4)$$

其中, DV 代表异质性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城市行政层级($Super$)、企业税收优惠条件($Discount$)以及企业发展阶段($Unstrong$ 、 Old)。 β_1 表示某类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受文明城市创建影响的幅度和方向, β_2 表示另一类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受文明城市创建影响的相对幅度和方向, $\beta_1 + \beta_2$ 则表示另一类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受文明城市创建影响的绝对幅度和方向。

(一) 城市行政层级异质性

虽然本文在清洗数据时已将直辖市、少数民族自治州(盟、旗)以及省直管县或县级市全部剔除,但文明城市参评的地级市仍可细分为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一般地级市。相较于一般地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不仅能享受到更丰富的国家政策红利,而且能对地区内其他城市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这些都会改变辖区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此,本文构造城市行政层级的虚拟变量 $Super$,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赋值为1,一般地级市赋值为0。

表6第(1)、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在何种行政层级的地级市中,文明城市创建都会增强企业的纳税遵从,但一般地级市的企业受影响程度更大。究其原因,主要如下:从“共建”的角度来看,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通常有着更为系统全面的稽查体系和更加公正严明的法治环境,辖区企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规则的遵从程度相对更高,文明城市创建的实际效应并不突出;从“共享”的角度来看,整合资源能力更强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文明城市创建之前已经为辖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文明城市创建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而一般地级市往往处于后发追赶的阶段,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可以充分挖掘其治理潜能,进而展现出规模经济特征(何凌云、马青山,2021)。

表6 异质性分析:城市行政层级和企业税收优惠条件

变量	(1)	(2)	(3)	(4)
	城市行政层级		企业税收优惠条件	
$Civilization1$	-0.0145*** (0.0039)		-0.0123*** (0.0036)	
$Civilization2$		-0.0072*** (0.0022)		-0.0053*** (0.0019)

续表 6

变量	(1)	(2)	(3)	(4)
	城市行政层级		企业税收优惠条件	
<i>Civilization1</i> × <i>DV</i>	0.0121 ** (0.0061)		0.0109 ** (0.0051)	
<i>Civilization2</i> × <i>DV</i>		0.0078 ** (0.0033)		0.0055 ** (0.0028)
<i>DV</i>	-0.0075 (0.0052)	-0.0087* (0.0050)	-0.0174 *** (0.0038)	-0.0168 *** (0.00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281 *** (0.0295)	0.1312 *** (0.0294)	0.1104 *** (0.0298)	0.1118 *** (0.0298)
观测值	13620	13620	13620	13620
R ²	0.0487	0.0485	0.0498	0.0494

(二) 企业税收优惠条件异质性

前文已述及, 纳税人承担税负与税收回报之间的落差会直接影响其纳税遵从意愿, 而政府对特殊类型、特别行业以及特定地区的资质认定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无疑缓解了企业的纳税痛感, 使其实施更积极主动的缴税行为。为区别税收优惠和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本文构造了企业资质认定的虚拟变量 *Discount*, 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 税率优惠、部分行业或地区“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各项税收优惠的企业赋值为 1, 将未获得任何资质认定税收优惠的企业赋值为 0。

表 6 第 (3)、第 (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文明城市创建使那些从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纳税, 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 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本身就有相对更高的纳税遵从意愿, 文明城市创建对于纳税遵从度已处在高位的企业无法产生更强的激励效应; 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文明城市创建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税收收益, 从而与直接给予税收优惠的措施产生了互补作用, 企业自觉纳税的意识不断增强。上述结果表明, 政企互动形式的创新有助于提高政府治理效能、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而单一的优惠措施极易形成税收洼地, 因此多管齐下方能实现地区的长远健康发展。此外, 政府应尽可能考虑企业受益程度, 强化企业对地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充分挖掘企业的经济贡献潜力。

(三) 企业发展阶段异质性

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可能面临不同的生存压力、发展诉求和市场环境, 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行为。为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 本文根据企业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 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淘汰期五个阶段。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已成功上市企业, 它们基本度过了初创期, 因此

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进一步简化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刘诗源等 2020) ,具体的划分标准见表 7。

表 7 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

现金流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衰退期	衰退期	淘汰期	淘汰期
经营现金流净额	-	+	+	-	+	+	-	-
投资现金流净额	-	-	-	-	+	+	+	+
筹资现金流净额	+	+	-	-	+	-	+	-

本文构造了企业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 $Unstrong$ 、 Old 。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衰退期时 , $Unstrong$ 取值为 1; 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 , $Unstrong$ 取值为 0。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 , Old 取值为 1; 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时 , Old 取值为 0。

表 8 反映的是文明城市创建作用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实际效应。可以看出 ,相对于成熟期企业 ,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共性特征来看 ,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都是市场中的绝对弱势群体 ,文明城市创建的经济效益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的经营利益 ,使企业纳税遵从度的主动性不断提高。而在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当中 ,后者受到文明城市创建的影响更大。

表 8 异质性分析:企业发展阶段

变量	(1)	(2)	(3)	(4)
	双重差分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Civilization1$	-0.0089 [*] (0.0048)	-0.0111 ^{**} (0.0047)		
$Civilization2$			-0.0069 ^{**} (0.0030)	-0.0082 ^{***} (0.0029)
$Civilization1 \times Unstrong$	-0.0105 ^{**} (0.0047)	-0.0147 ^{***} (0.0051)		
$Civilization1 \times Unstrong \times Old$		-0.0090 [*] (0.0047)		
$Civilization2 \times Unstrong$			-0.0043 [*] (0.0024)	-0.0076 ^{***} (0.0027)
$Civilization2 \times Unstrong \times Old$				-0.0091 ^{***} (0.0027)
$Unstrong$	0.0164 ^{***} (0.0034)	0.0104 ^{**} (0.0044)	0.0150 ^{***} (0.0032)	0.0106 ^{**} (0.0044)
Old		0.0054 (0.0051)		0.0033 (0.0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8

变量	(1)	(2)	(3)	(4)
	双重差分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地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931 *** (0.0284)	0.0950 *** (0.0282)	0.0849 *** (0.0287)	0.0864 *** (0.0285)
观测值	13618	13618	13618	13618
R ²	0.0504	0.0503	0.0502	0.0501

从这些结果来看,虽然文明城市创建整体上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改善了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但文明城市创建给不同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过程中,未来各城市需要思考的重点是如何惠及更多企业。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准自然实验,主要探究共建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如何影响辖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实证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促使企业更少逃税、纳税遵从度更高,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共建文明城市使企业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企业更加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共规则,由此形成的规范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纳税遵从;其二,共享文明城市荣誉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由此形成的激励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纳税遵从。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非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的企业以及未享受资质认定税收优惠的企业受到文明城市创建的影响更大,由此说明文明城市在缩小各地发展差距、提升地区治理水平以及丰富政府支出策略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发现,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受文明城市创建的影响更大,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纳税遵从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本文的研究对健全文明城市评选体系、促进税收征管现代化以及升级地方竞争格局等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文明城市评选的考核体系要融入更多的政府治理理念。评选文明城市应坚持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在现有加大违法违规处罚力度、扩大社会征信覆盖范围以及推广诚信教育实践等考核指标的基础上,把反映政府治理思维、治理过程和治理成效的度量标准(如政府制定决策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频率;决策执行时,非机要事项的公开透明;等等)也纳入评选范畴。

其次,税收征管应采取更多激励式的柔性措施。一方面,税务机关要不断扩大对A级纳税人的联合激励范围,建立健全同工商、交通以及银行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度,使企业在积极纳税的过程中享受更多实质优惠;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来满足企业的必要诉求,从而增强企业的纳税获得感,降低企业的纳税痛苦程度。

最后,各地要实施更加多元化、系统性的发展策略,推动城市竞争格局迈上新台阶。除了以GDP、人均收入等显性指标反映地区发展水平之外,地方政府还需注重营商环境的营造、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健康市场的构建,不断增强自身软实力。此外,后发城市要将综合竞争力作为赶超发

达地区的加速器,利用“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智慧城市”等荣誉称号的品牌优势,形成对外界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参考文献:

1. 鲍宗豪《文明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化》,《中国名城》2011年第4期。
2.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3. 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管理世界》2016年第5期。
4. 樊勇、李昊楠《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5. 范子英、田彬彬《政企合谋与企业逃税:来自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4期。
6. 龚锋、李博峰、卢洪友《文明城市的民生效应分析——来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证据》,《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12期。
7. 郭月梅、厉晓《从税收管理走向税收治理——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思考》,《税务研究》2017年第9期。
8. 何凌云、马青山《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财贸研究》2021年第3期。
9. 黄贤环、王瑶《实体企业资金“脱实向虚”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抑制”还是“促进”》,《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10. 李建军、范源源《光环之下:纳税声誉能否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当代财经》2020年第8期。
11. 李林木、于海峰、汪冲、付宇《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12. 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13. 刘树海《货币政策冲击、存货持有行为与企业避税强度——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税务研究》2019年第1期。
14. 刘行、赵晓阳《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15. 逯进、赵亚楠、苏妍《“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一项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0年第4期。
16. 孙雪娇、翟淑萍、于芬《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3期。
17. 石大千、胡可、陈佳《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产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
18. 田彬彬、邢思敏《税收道德对中国企业逃税的影响——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经验证据》,《税务研究》2017年第10期。
19. 许红梅、李春涛《社保费征管与企业避税——来自〈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20. 魏志华、夏太彪《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财务压力与企业避税》,《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7期。
21. 吴海民、吴淑娟、陈辉《城市文明、交易成本与企业“第四利润源”——基于全国文明城市与民营上市公司核匹配倍差法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22. 姚鹏、张泽邦、孙久文、闫昊生《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财经研究》2021年第1期。
23. 余泳泽、郭梦华、胡山《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9期。
24.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25. 张辽、吴聿杰《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增长效应”与“平滑效应”的比较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26. 赵磊《税收遵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税务研究》2016年第7期。
27. 朱光顺、张莉、徐现祥《行政审批改革与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3期。
28. Alm, J., Schulze, W., Bose, C., & Yan, J., Appeals to Social Norms and Taxpayer Complian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86, No. 2, 2019, pp. 638 – 666.
29. Beck, T., Levine, R., &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5 ,No. 5 2010 ,pp. 1637 – 1667.

30. Brink ,W. ,& Hansen ,V. ,The Effect of Tax Authority – Developed Software on Taxpayer Compliance. *Accounting Horizons* , Vol. 34 ,No. 1 2020 ,pp. 1 – 18.

31. Dinku ,T. , & Alamirew ,A.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Voluntary Taxpayers Compliance: The Case of Amhara National Regional State Revenue Author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 Financial Affairs* , Vol. 7 ,No. 1 2018 ,pp. 1 – 6.

32. Hunt ,N. , & Iyer ,G. ,The Effect of Tax Position and Personal Norms: An Analysis of Taxpayer Compliance Decisions Using Paper and Software. *Advances in Accounting* ,Vol. 41 2018 ,pp. 1 – 6.

33. Jimenez ,P. , & Iyer ,G. ,Tax Compliance in a Social Sett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 , Trust in Government , and Perceived Fairness on Taxpayer Compliance. *Advances in Accounting* ,Vol. 34 2016 ,pp. 17 – 26.

34. Lamberton ,C. , Neve ,J. , & Norton ,M. ,The Power of Voice in Stimulating Morality: Eliciting Taxpayer Preferences Increases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Vol. 28 ,No. 2 2018 ,pp. 310 – 328.

35. Rahayu ,Y. N. ,The Role of Taxpayer Awareness , Tax Regu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Taxpayer Compli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Vol. 9 ,No. 10 2017 ,pp. 139 – 146.

36. Yuniarta ,G. , & Purnamawati ,I. ,Spiritual ,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axpayers Compli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Vol. 27 ,No. 3 2020 ,pp. 995 – 1007.

The Power of Honor: Does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ward Enhance Enterprises’ Tax Compliance?

ZHAN Xinyu(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100048;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WANG Yihu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odernize China’s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new era by building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ax paying enterprises , and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Campaign , also characterized by “joint contribution” and “benefits for all” is a typical new model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Therefore ,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Campaign from 2005 to 2019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 and uses the Multi-period DI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how this urban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benefits for all affects the tax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urban governance mode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ax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jurisdiction , and this finding has passe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ormative effect on both sides in the “joint contribution” stage before winning the title of civilized city and the incentive effect formed by “benefits for all” brought by the title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ax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jurisdiction. Moreover , the impact of the civilized-city designation on the tax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shows distinct heterogeneity in c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 with different preferential tax condi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lifecy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novative urban governance model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t the local level , but also a useful attempt to expand the pattern of tax co-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

Keywords: Civilized City , Tax Compliance , Governance , Tax Co-Governance

JEL: H25 , H32 , R58

责任编辑: 非同